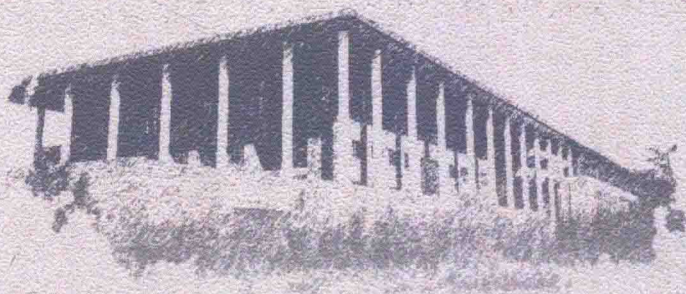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大学变革与院校研究

周光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大学变革与院校研究

University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周光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变革与院校研究/周光礼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301-28384-4

I. ①大… II. ①周…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G64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1430 号

- | | |
|-------|--|
| 书 名 | 大学变革与院校研究
DAXUE BIANGE YU YUANXIAO YANJIU |
| 著作责任者 | 周光礼 著 |
| 责任编辑 | 唐知涵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384-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yl@pup.pku.edu.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056 |
| 印 刷 者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310 千字 |
|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相似的挑战、不同的逻辑：院校研究的中国化

院校研究诞生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院校研究概念被介绍到中国。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成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标志着院校研究在中国开始制度化。院校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自我研究,以发现学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学校工作的改进。^① 尽管美国院校研究引入中国已近30年,但院校研究在中国依然处于无序状态,学校从事院校研究的机构五花八门,有些学校是院校研究所或高等教育研究所,有些学校是发展规划处、学科办、评估中心、政策研究室等,而且很多学校这些机构同时设置,院校研究力量分散。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言,倘若我们发现同样一种荒谬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是彻底荒谬的,否则它就不会反复出现。如何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是中国院校研究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序从院校研究动力机制的角度探讨如下问题:中美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有什么异同?中国的行动者是如何理解院校研究的?中国院校研究的突破点在哪里?

一、冲击-应对模式：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

当代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开放系统的观念。人们相信,变化中的环境条件是组织变革的外在动力,组织受到的影响、组织的回应,都直接来自于环境。这就是“冲击-应对模式”,其核心观点是组织变革是一种外部冲击、内部反应的模式,即组织变革主要受着外界的影响,并努力适应着外界的需求。这种模式对于解释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具有较高的适切性。

^① 赵炬明. 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综述[J]. 高等教育研究, 2003(5).

院校研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组织自主权。没有办学自主权,学校就不能自主地、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方向和建构院校系统。就历史文化基因而言,世界有两大高等教育体系:罗马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德国、法国等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强调国家对大学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英国、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则重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独特传统难以被轻易改变,这是美国大学拥有充分自主权的历史文化基因。据此,我们很容易解释院校研究为何首先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很难解释院校研究为什么首先产生于美国,而不是英国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英联邦国家。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院校研究产生的环境条件。

院校研究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这里的资源配置是指大学的办学资源从何而来或者说谁控制大学的办学资源。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官僚控制模式,即高等教育经费配置决策由校外机构如中央政府做出,办学经费根据明确规定的分配标准分配给各院校。二是院校控制模式,即院校有条件获得独立的经费来源,如大学自己拥有土地、财产或捐赠。三是市场模式,即大学通过出卖服务(教学、研究和咨询)来获得收入。^①资源配置的市场模式是院校研究产生的制度根源。没有办学资源的竞争和组织生存的危机,大学一般不会自觉地提出管理的质量和效益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旨在改进学校工作,提高管理效益的院校研究。

赵炬明在考察美国院校研究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逻辑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即院校研究是在大学由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变过程中作为现代大学管理的参谋而出现的。他认为,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在组织和管理上有根本的不同:19世纪的传统学院规模小,以联系紧密的学者共同体和经验管理为基础;现代大学规模巨大,以科层制和专业化管理为基本特征。^②他进而认为,推动大学组织和管理上转型的驱动型因素是大众化。院校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规模直接相关,规模大、组织结构就复杂,管理也就越复杂。巨型大学的产生,管理的复杂性超过管理者的能力,于是需要别人帮助他收集信息、分析问题、提供咨询。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产生了对院校研究的普遍需要。这些观点当然是成立的。从冲击-反应模

① 伯顿·R. 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89.

② 赵炬明. 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综述[J]. 高等教育研究,2003(5).

式来看,院校研究是大学面对外部环境冲击而做出的一种组织反应。大众化不仅给大学内部的组织和管理带来了直接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其重塑了大学的外部环境。首先,大众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大众化以及普及化促使大学的办学经费由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向主要依靠学生和学校转变。学费上涨使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由行政关系向市场关系转变。学校自筹经费比例的上升加剧了外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生源、师资、科研经费等都需要通过市场化竞争获取。其次,大众化推动了社会问责制的建立。市场化使政府、社会和学生有意识地利用手中的资源迫使大学确立效益原则,进而形成监督大学工作的问责机制(信息公开、评估、认证等)。由此可见,大众化直接造成了办学资源的紧缺和社会监督的加强,重塑了大学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压力下,美国大学决定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研究人员从事院校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研究院校发展问题,提供决策咨询,院校研究就此诞生。

应该说,院校研究在美国的产生是社会需求逻辑推动的。院校研究从“二战”后创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发展,从美国大学的一种制度创新发展成为一种国际化现象,在于它满足了社会对大学管理改进的迫切需要。

二、高等教育研究转型：中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

关于中国院校研究的创生,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院校研究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是一种本土化的制度创新。1980年前后,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为了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中国高校普遍设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者高等教育研究室(属行政系列)。这些机构主要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开展“校本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院校研究产生于大众化时代,是一种美国制度的全球扩散现象。1999年,随着扩大招生政策的开启,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是否需要像美国一样开展院校研究。如其所言,“如果中国高等学校也面临规模不断扩大及社会问责不断增强的挑战,中国高校是否需要院校研究”^①。在刘献君、赵炬明等推动下,华中科技大学于2000年率先成立了以学校管理为研究对象的院校研究机构。

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能用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来解释。根据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院校研究产生的前提是学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

^① 赵炬明. 中国大学与院校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05(8).

权。作为具有浓厚罗马传统色彩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强调国家行为,学校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之初的“校本研究”如果属于院校研究,显然与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的逻辑前提不符。根据冲击-反应模式,大众化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社会问责制的建立,进而产生了对院校研究的普遍需求。但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历史文化基因的不同,面临相似的挑战并不一定引起相似的反应。这是因为有三种不同的范式塑造了大学的实际反应。第一种是本国特色范式,即几乎所有国家在所有改革中都将保留其独特传统的某些基本元素。第二种是现代化范式,即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寻找最先进的解决办法。原则上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可能被所有国家采用。第三种是政治范式,即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民情绪,每个国家都会选择不同的改革等级。^①事实上,在中国大学变革与转型过程中,历史积淀与承袭下来的“国家行为”一直是其主导因素。在中国,大众化并没有带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国家中心模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大众化也没有带来社会问责制的建立,基于公共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管办评分离”改革依然只停留在政策层面。中国大多数学校也并没有产生对院校研究的强烈需求,院校研究在大学内部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由此可见,社会需求逻辑很难解释中国院校研究的创生与发展。

中国院校研究的发展主要遵循学科逻辑而非社会需求逻辑。中国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转型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始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校本研究”。3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由经验性研究向学科化转型。在初创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以经验研究为特色。由于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属行政系列,加之大部分研究者理论储备不足,“校本研究”朝着行政化方向发展。^②值得指出的是,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部分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有意识地朝学科化方向发展,走向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之路。第二次转型是由学科化、理论化向跨学科、实用化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普遍开展,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了学科化时代。高等教育研究为了在大学中获得学术地位,不断强化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科的专业性,使得学科专业壁垒增加、学术研究脱离实践等弊端日益凸显,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正如院校研究学会会长

① 乌尔里希,迈向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国际比较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体系.泰希勒,肖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90.

② 刘献君.院校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前言.

刘献君所言,高等教育研究成为只开花不结果的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亟待转型。转型的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需要与大学决策有更紧密的联系,使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心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转到学校管理的实践研究,使其研究更贴近决策需求;二是需要与其他学科有更紧密的跨学科合作,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研究;三是需要更加关注中国实践和中国国情,重视中国元素,开创高等教育的实践学派。“强烈面向问题、强烈面向实践、强烈面向应用”的院校研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转型的新方向。院校研究的核心是为学校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跨学科性。^①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向院校研究转型可以用知识生产模式Ⅱ理论来解释。知识生产模式Ⅱ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学术界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学术转型:知识生产模式Ⅰ正在转向知识生产模式Ⅱ。与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模式Ⅰ)不同,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导向和跨学科特点。^②

院校研究在中国的产生是学术转型推动的。院校研究从世纪之交勃兴发展到现在依然处于无序状态,是因为我们引入美国经验时对两国院校研究发展逻辑的差异缺乏清醒的认识,执着于用美国院校研究的标准套用中国的实践。如果说美国院校研究是社会需求逻辑决定的,中国院校研究则是学术转型逻辑推动的。因此,美国院校研究的倡导者是学校变革的行动者,中国院校研究的发起者是学术研究者。

三、院校研究:引领大学变革

院校研究虽然起源于美国,但院校研究已经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化现象,院校研究在中国必然经历一个制度重组过程。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现成的制度原则和实践模式,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原则和模式来进行创新。事实上,在一种制度的全球扩散过程中,行动者可以通过选择、理解、合并、重构等方式,融入本土元素,形成新的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中国院校研究的突破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推动院校研究的发展逻辑从学术转型逻辑走向社会需求逻辑。一方面要推动高等教育宏观治理模式的变革,为院校研究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① 周光礼. 政策分析与院校研究:中国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J]. 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② 文东茅,沈文钦. 知识生产的模式Ⅱ与教育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4).

另一方面要引导院校研究者面向实践,密切跟踪院校管理的需求,满足需求、创造需求。第二,推动院校研究从管理研究走向变革研究。推动大学变革是院校研究的主要使命,院校研究必须聚焦于大学变革,为建立有效的院校系统服务。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大学变革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体制层面的变革,二是管理层面的变革,三是技术层面的变革。其中,技术变革以管理变革为前提,管理变革以体制变革为前提。第三,推动院校研究从模仿借鉴走向自主创新。中国院校研究的技术、方法可以从美国移植和借鉴,但院校研究的问题意识、决策模式却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元素。围绕大学变革,院校研究应抓住三大中心论题。一是宏观政策研究。中国大学变革的影响因素,50%以上需要用宏观政策变革来解释。尽管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高等教育变革中的国家行为却没有改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虽已昭示大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外部环境的冲击对大学的直接影响却不大。外部环境主要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对大学施加强大的影响,这是中国院校研究必须重视宏观政策的重要原因。二是院校决策研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由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由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和精细化管理要求建立基于证据的决策和基于数据的决策。战略发展规划是院校决策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决策议程的产生到改革方案的建构,从政策的合法化到改革的实施,院校研究需要全程参与,而且要逐步实现由决策支持向决策引导转变。三是监测与评估研究。没有监测就没有问责,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院校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回应外部问责,确保大学办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监测与评估不但能够有效识别院校发展存在的问题,而且能够提供有力的质量证据。

大学变革就是大学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而做出的积极反应,一般涉及组织与结构的调整。在本书中,我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大学变革是院校研究的中心论题。院校研究是当代高等教育研究最具活力的研究方向,院校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其强力地面向问题、强力地面向现实、强烈地面向应用。大学变革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研究形态,院校研究与大学变革十分切合。第二,大学变革的驱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大众化是驱动大学变革的外部力量。除此之外,大学变革还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先前的实践影响其后的选择,历史决定现实,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人们常说,大学是遗传与环

境的产物。这句话道出了影响大学变革的内外部因素。第三,大学变革还常常取决于关键的行动者。正是因为行动者的加入,大学变革更复杂、更具偶然性。从行动者的角度看,大学变革有两种逻辑,一种是人为设计逻辑,另一种是自然演化逻辑。前者使大学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性的变迁,后者使大学在长时段内发生渐进性的演变。人为设计在短期内会产生很大功效,但自然演化才是大学变革的常态。第四,大学变革主要表现为大学组织结构的调整。大学传统的组织结构是行会模式,这种模式运行的关键是拥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大学的现代化就是把科层组织模式引入大学。这种等级管理模式在满足大规模教学工作的需要和维护广泛接受的标准方面,曾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也是阻碍变革的主要因素。

我把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研究范式的建构,主要致力于建构一个分析框架,用于理解大学变革。该分析框架解释大学变革主要受外部环境、组织文化和关键行动者三个方面的制约。第二部分是实证研究的积累,主要通过案例检验理论框架的解释力。案例研究遵循复现逻辑而非抽样逻辑,案例研究对理论的检验是强检验。一个理想的分析框架必须具有四个功能,即描述、解释、评价和预测。第三部分是未来大学的展望,基于需求决定论和复杂系统理论,对未来的大学模式进行了前瞻性思考。

本书的内容是根据我2011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政策分析”博士生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给了我诸多的启示和帮助。《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原主编姜嘉乐先生、《中国高教研究》的主编王小梅女士给了我有益的评论和指导。我的几位学生吴越、张芳芳、莫甲凤、黄容霞为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同事秦惠民、申素平、李立国、胡娟、严平、周详、潘昆峰、崔盛、叶阳永等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

目 录

第一部分 研究范式的创新

第一章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3)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知识基础与制度基础	(3)
二、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6)
三、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状况	(8)
四、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	(11)
五、回归复杂性：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	(15)
第二章 高等教育智库及其研究风格：中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转型	(18)
一、引论：智库时代的高等教育研究	(18)
二、学术转型：六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定性描述	(21)
三、学术风格：六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定量描述	(29)
第三章 政策分析与院校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44)
一、院校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	(44)
二、院校变革的政策过程：院校研究的中心论题	(47)
三、从个案分析到多案例研究：院校研究的基本进路	(53)
第四章 大学组织变革研究：前沿及进展	(57)
一、问题提出	(57)
二、同构性理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59)
三、分化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61)
四、同质异形理论：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63)
五、评价和前瞻	(66)

第五章 大学变革与转型：新的思路与新的分析	(71)
一、导论	(71)
二、大学变革史：描述与阐释	(72)
三、大学变革的动力机制：经济学、政治学与制度学派的解释	(77)
四、同质异形现代化：西方大学变革的历史想象	(82)

第二部分 实证研究的积累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同构：亚洲大学的应对	(87)
一、引论	(87)
二、制度同构：亚洲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88)
三、制度转化：亚洲精英理工大学变革中的差异性	(92)
四、结论：制度转化的政策含义	(104)

第七章 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制度困境及其破解	(106)
一、“行政化”的维持与变迁机制：制度主义的视角	(107)
二、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历程	(111)
三、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困境	(117)
四、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实现路径	(125)

第八章 从竞争到合作：C9 联盟组织场域的建构	(129)
一、引论	(129)
二、理论基础：制度是如何创建的？	(130)
三、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全球大学联盟的兴起	(132)
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C9 联盟建立的宏观背景	(135)
五、从政策论坛到精英大学联盟：C9 联盟的制度化过程	(137)
六、场域逻辑的建构：高等教育系统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	(150)
七、结论	(160)

第九章 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的制度逻辑：多伦多大学的 案例研究	(163)
一、引言	(163)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64)

三、多伦多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的历程描述	(166)
四、多伦多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的制度逻辑	(174)
五、结论	(184)

第十章 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华中科技大学的 案例研究	(185)
一、中国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总体背景	(185)
二、华中科技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	(188)
三、华中科技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设计	(194)
四、中国公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需率先解决的几个问题	(201)

第十一章 大众化与大学转型：中国重点理工大学变革的 多案例研究	(204)
一、问题与背景	(204)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206)
三、中国重点理工大学的转型：三所大学的案例描述	(209)
四、研究发现	(226)
五、结论	(229)

第三部分 未来大学的展望

第十二章 回归复杂性：未来大学展望	(233)
一、复杂性及其简单化：现代大学的组织模式	(234)
二、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大学变革的外部动力	(238)
三、走向复杂性：未来大学模式的建构	(244)
第十三章 区域知识创新中心：大学的新模式	(252)
一、引论	(252)
二、区域知识创新中心：理论基础与概念模型	(253)
三、武汉未来科技城：一种未来大学模式	(257)
四、结论	(267)

第一部分 / 研究范式的创新



第一章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学科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学术制度。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合法性，即知识基础；二是外在合法性，即制度基础。内在合法性的标志是形成一套广泛认同的文化-认知体系，外在合法性的标志是形成学科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学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第二个阶段主要遵循学科逻辑，致力于学科知识传统的建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但缺乏深厚的知识基础。展望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但要形成普遍认同的知识传统和价值观念，而且要进一步加强体制化，争取高等教育学的一级学科地位。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最近因少数综合性大学撤销或重组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而引起普遍关注。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都在反思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与独立性，最新的事件只是加深了人们的焦虑。这些反思并非仅集中在高等教育学的体制化上，而是更多地集中在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传统上。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传统是什么？高等教育学独特的概念模式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动摇着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本章首先从知识基础和制度基础阐述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然后从学科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的视角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力机制，并通过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描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基础，通过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最后讨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知识基础与制度基础

什么是学科？学科的基本含义是知识体系，不同的学科意味着不同

的知识体系。学科与科研相关,学科发展表现为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发现与创新,而且意味着知识的整合与系统化。学科的引申含义是学术制度,即以分科研究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① 学科建设不仅意味着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意味着学术制度的建构。前者指的是学科的概念模式和认识规范,后者指的是支撑学科发展的社会组织及其他制度安排。学科的生命力植根于知识体系的建构。

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是界定研究对象。任何学科都是由研究对象界定的,而不是由研究方法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另一门学科的主要依据,但各学科的方法可以共用。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学科分类是逻辑决断的结果。现实世界是一切学科的立足点,它是无限的,是有机统一的,具有不可分性。然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如庄子所感叹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为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人们不得不从整体世界中划定一个有限的范围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把一个论题从其他论题中分离出来。^② 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截然分开,故学科的界限很难划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的界限具有可渗透性,各学科是相通的。

虽然把知识分解为各学科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但这种学科的划分一旦形成就难以推翻。这是因为学科建设不仅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是社会管理知识方式的建构。学科一旦建立,不但框定了某种精神领地,而且学科本身也逐渐自我稳固。这时,我们说学科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传统。知识传统对于该学科的学者具有强大的规训力。^③ 学科建构是一个制度化过程,学科演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学科建构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学科建构不仅涉及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学术薪火承接人的培养,而且涉及学术共同的建立和个人地位的建构。要改变这个学科划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学科结构,就要对已建立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由于社会成本、适应性预期、协同效应以及权力不对称等制度性因素的约束,大部分的挑战不会成功。

学科的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合法性,即知识传统;二是外在合法性,即制度基础。前者强调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主题(研究对象)和适切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后者强调一个成熟的学科

① 周光礼.反思与重构:教育法学的学科建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6).

② 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中国高教研究,2016(1).

③ 周光礼.反思与重构:教育法学的学科建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6).